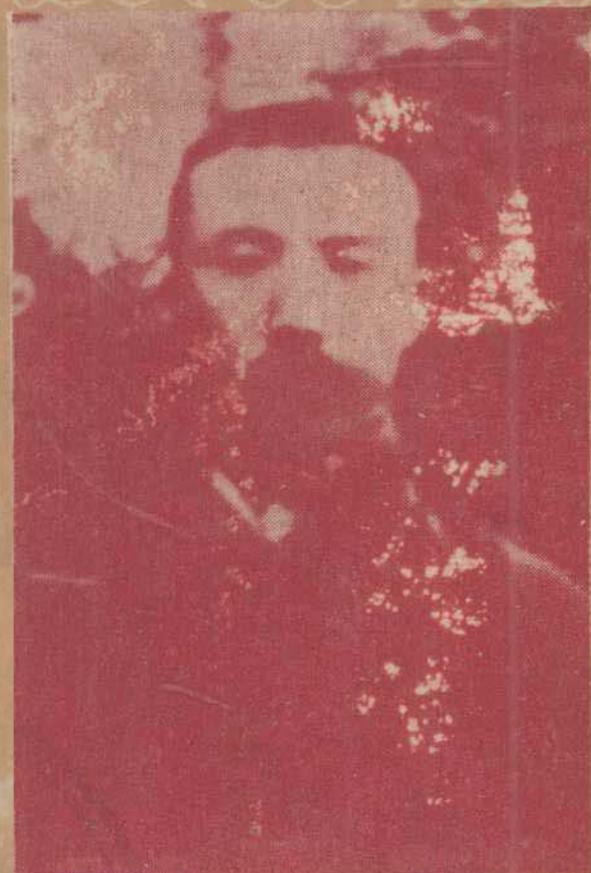


書叢小科百國中新

傳小士烈六共中

著等明李



新中國書局

1949

新中國百小傳

中 共 六 烈 士 小 傳

李 明 等 著

新中國書局

1949

目 次

| | |
|-------|----|
| 一 李大釗 | 一 |
| 二 向警予 | 二 |
| 三 蘇兆徵 | 二 |
| 四 澄漪 | 四 |
| 五 懇代英 | 六一 |
| 六 瞿秋白 | 七三 |

— 李大釗

李大釗同志是河北省樂亭縣人，生於清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死於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享年三十有九。先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攻政治經濟、後留學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系。民國成立，大釗同志學成歸國，被北京晨報社聘爲主任編輯。北京晨報在當時是比較激進的報紙，大釗同志就在這個報紙上宣傳民族革命的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得到廣大青年讀者歡迎，使晨報的銷路驟然增加。

一九一四年，袁世凱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暗助下，陰謀恢復帝制，大釗

同志就首先在報紙上樹起反對袁氏稱帝的旗幟，揭露袁氏的陰謀，痛斥帝制的罪惡。一九一五年一月一日袁氏宣佈稱帝，大釗同志更奔走呼號，猛力攻擊，由大釗同志所點着的反對袁氏稱帝的火炬，終於燃燒全國，消滅了袁氏帝制。

大釗同志對於袁世凱因稱帝而和日本帝國主義簽訂賣國的『二十一條』，以及『西原借款』，更是深惡痛絕，極力反對。大釗同志的這種民族革命的思想，英勇鬪爭的精神，受到許多人，尤其是許多青年學生的衷心敬仰。當時北京各學校的學生都要求學校聘請大釗同志講學，不久大釗同志就被聘爲北京大学的經濟學教授，並兼北大圖書館長職。

在擔任北大圖書館長和經濟學教授時，大釗同志特別注意於擴充有關

民族思想的書籍，並盡力向學生灌輸民族革命的思想。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爆發了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五四運動』，廣大羣衆尤其是青年學生，舉行示威，反對日本在歐戰和會上所提出佔有德國歸還我國的青島、膠州灣等處的無理要求，反對北京政府簽字於巴黎和約。這個運動的首先發動者是北大學生。這是大釗同志和當時北大的其他一些先進教授，經常以民族革命的思想灌輸於北大學生的結果。

大釗同志不僅是思想上的灌輸者，而且是『五四』運動的直接組織者和領導者。北京大學所以能成爲『五四』運動的主要骨幹，大釗同志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五四』運動又是文化上和思想上的革命。在『五四』運動後，新文

化運動就開始蓬勃起來，向舊禮教舊文化擲出了投槍。而大釗同志正是一個勇猛的槍手。他是『新青年』雜誌編者之一。他在思想上的貢獻是很大的；他不只破壞傳統中國的舊思想，而且建立了一種較有系統的新思想。

大釗同志可以說是辯證法唯物論和唯物史觀的最先介紹者與傳播者。

大釗同志不但有民族革命的思想，而且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是馬克思、列寧的信徒。他在日本留學時，就特別注意研究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和列寧主義。在北大擔任圖書館長時，搜集了許多馬克思學說的書籍。他在北大所講授的經濟學，是以馬克思經濟學說為中心基礎的。他介紹馬克思學說的書籍給學生看，解答學生的疑問，循循善誘，誨人不倦。他決不放棄任何宣傳馬克思學說的機會，他的這個功績，就成了北方共產主義運動

的基礎。

經過了一個時期宣傳馬克思的學說之後，大釗同志就着手進行共產主義的組織活動了。一九二〇年，他在北京各學校組織了社會主義研究組，並組織了共產主義的小組，準備創立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大釗同志是創始人之一。他是北方黨的唯一創造者和領導者，也是全國黨的堅強而優秀的領導者之一。

大釗同志對於促成國共合作，也起了極大的作用。他原是辛亥革命時代的國民黨員，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後，是國民黨中最有威望的中央委員。大釗同志深刻認識當時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提議：『只有民族統一戰線，只有國共合作，才能開展廣大的革命運動。』大釗同志用了他的

智慧、能力與忠貞執行了我黨的政策，促成了國共合作。在國民黨改組的綱領上，使孫中山先生明白了最有利於民族革命運動的『三大政策』，大釗同志是起了作用的。

黨和大釗同志在北方採取聯合國民軍，打倒直系曹吳軍閥的策略，並在羣衆中造成廣大的革命基礎。結果國民軍取得了北方數省的政權，造成了南北革命統一的前途，使孫中山先生得以北上。在孫中山先生北上和逝世前後，一切政治上的籌劃，策略上的決定，和實際工作上的措施，大釗同志都是最主要的主動者之一。

一九二六年三月，日本帝國主義派了四艘驅逐艦，掩護奉天軍閥張作霖的軍隊進攻天津，國民軍實行正當防衛，制止日艦通行，日本帝國主義

就和英帝國主義所領導的東交民巷公使團，援引辛丑條約向中國政府提出最後通牒，限期答覆並要求撤廢大沽口的一切防禦工事，因而引起北京學生市民的憤怒，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前舉行示威，並向執政府請願，結果被執政府開槍射殺，釀成空前的流血慘案。大釗同志是這一次反日運動的最主要的領導者，他曾親身參加和指揮了那一次的示威與巷戰。當執政府門前流血慘劇發生時，徐謙等便跳牆逃走，大釗同志雖頭部受傷，卻仍然從容不迫、鎮靜地指揮羣衆退卻。他真是一位進攻在前而退卻在後的勇敢的領導者、指揮者。

• 7 •

『三一八』慘案後，大釗同志更成爲北方青年北方羣衆革命鬪爭的燈塔，同時也就成了日本帝國主義、軍閥張作霖和北方政府的眼中釘，所以

一九二六年，當國民軍退出天津北京，北京政權爲張作霖所擾，大釗同志就被下令通緝。但大釗同志卻毫無畏懼，爲了堅持北京革命工作，雖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下仍然留在北京，繼續革命的活動。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奉系軍閥在帝國主義指使下，逮捕了大釗同志。

大釗同志被捕後，屢受軍閥嚴刑拷打，逼問口供，用竹籤敲進大釗同志的指甲縫裏，及其他各種毒刑，大釗同志始終堅貞不屈，氣節凜然。他在監獄裏盡量宣傳共產主義，受到全監犯人的敬愛。大釗同志在監獄中還繼續領導北方黨的工作，那些看守的兵士，爲他的崇高的精神所感，自願的成了大釗同志傳遞指示信件的交通員。

大釗同志被捕消息傳出後，一般同志和羣衆都非常悲憤。尤其北方鐵

路工人同志，曾計劃劫獄，搶救大釗同志。大釗同志知道後，堅決反對這種冒險行動。他感謝同志們對他的愛戴，但他看出在那時完全沒有實現這種計劃的可能，他不願意同志們做這種冒險而受無益的犧牲，使革命的力量再遭損失。北方黨接受了大釗同志的指示。大釗同志的這種爲黨爲革命而無個人的精神，實在是我們的最好模範。

社會的輿論以及廣大學羣衆、名流、學者、教育家的營救，都終於無效，大釗同志被所謂最高法院判決死刑，四月二十八日竟被絞殺。臨刑時，大釗同志不只是慷慨激昂英勇的步上刑台，而且還作了最後一次演說，宣傳了共產主義真理的必然勝利。使一切在場的人們無不受感動而流淚或嗟嘆。

大釗同志死後，遺櫬寄於宣外淨寺，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始安葬於北平西山萬安公墓。當時民衆輓曰：『爲革命而奮鬥、爲革命而犧牲，死固無恨；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可見民衆對大釗同志景慕欽仰之深。

大釗同志雖死，但他所教化的革命羣衆，尤其和他血肉相關的中國共產黨已經繼承着他的革命事業，並成爲目前全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堅強力量。我們紀念大釗同志、我們應繼承大釗同志的赴湯蹈火，百折不撓的戰鬥精神，應研究學習他所遺留給我們的寶貴指示。我們要繼續努力完成他未竟的革命事業，我們要爭取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

二 向警予

在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中國，婦女羣衆是最深刻的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迫與束縛，所以在中國人民解放的高潮中，婦女羣衆必然是一支有力的軍隊，同時，在婦女運動中也就產生出艱苦卓絕，堅毅勇敢的戰士和領袖，必然成爲廣大婦女羣衆的表率。向警予同志正是中國婦女羣衆這樣先進的戰士和領袖之一。

警予同志其所以成爲中國婦女界的先進與先覺，首先是在於她敏捷的見解，認識了中國婦女解放的道路，在她很早寫的論文當中就指出：『我

們應當注意和參加政治運動。現在一般婦女對政治問題好像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毫不關心似的，這樣奴隸心理，決不是覺悟的婦女所應有。」同時又說：『我們的工作應當深入到下層貧苦民衆中去，喚醒千百萬最受壓迫的婦女爲她們自己解放利益而奮鬥。』在這裏她很簡明的指出了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兩個最主要的問題：第一、她說明中國婦女解放是整個政治運動的一部分，是整個中國人民解放運動的一部分，婦女只有參加政治運動，只有在中國人民整個解放之中，才能爭取自己的解放。這正是指斥當時一部分受着帝國主義麻醉的所謂婦女解放運動者，企圖把婦女運動領導到脫離政治的和非政治的道路。第二、她指明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必須喚起最受壓迫的千百萬婦女羣衆的參加，這是針對着當時少數婦女解放運動者企圖

把婦女解放運動，限於少數智識界婦女的運動，變成爲貴族式的婦女運動。警予同志這一卓絕的見解，特別是她爲着這一見解而始終不移的奮鬥，就不能不使中國婦女解放運動，開闢着新的紀元，走到光明的坦途。

同時也正由於她這樣的見解，就使她不只成爲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進的戰士與領袖，而且就成爲中國解放鬥爭最堅決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爲中國解放鬥爭最堅決、最先進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光榮的幹部。

還在『五四』運動以前，警予同志肄業於湖南長沙的周南女學，她不只是爲全校所稱讚的優異的學生，而且在當時風氣之先的湖南學生運動當中就著有聲望。她是當時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湖南婦女界首倡人。所以不久，

她就赴法實行半工半讀。因爲她家境貧寒，無法供給學費，警予同志在法兩年，曾在樹膠工廠、紡織工廠做工，使她接觸了在當時法國工人階級中澎湃的革命潮流和馬克斯主義思想，而使她確定自己的革命人生觀，堅決信奉馬克斯主義。她與蔡和森同志等首先發起工學世界社，並極力宣傳馬克斯主義，與當時該社中許多複雜的思想，如無政府主義思想，社會民主派思想，工團主義思想等，進行過堅決的鬥爭，這就奠定了未來的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基礎。

一九二二年警予同志回國，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即在這次大會上被選爲中央委員。她從此時起就擔任中央婦女部的領導工作，在三四年的長期中，中共中央關於婦女運動的一切指導文件，大多數都是她